

《刘子》两钞本考索

林其铨 陈凤金

《刘子》又题《新论》、《刘子新论》，唐人亦称《流子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子部杂家类杨伟《时务论》条下有：“梁有《刘子》十卷，亡”的著录。此书流传一千多年，版本繁复。今存隋唐写本敦煌残卷五种，明清钞本六种。六种钞本分别是：明钞《刘子注》、明龙川精舍钞《刘子》、影钞活字本《刘子》、传钞黄丕烈藏本《刘子》、彭元瑞藏旧钞《刘子新论》、清谨轩钞《刘子新论》。今仅就北京图书馆藏的明钞《刘子注》和明龙川精舍钞《刘子》两钞本作初步考察。

一、明钞本《刘子注》

明钞《刘子注》十卷，装三册，署唐袁孝政撰。此本长29cm，宽17cm，双蓝线框栏，框高21cm，宽14cm，天头高6cm。蝉叶，每半叶九行，行满十七字，注低一格，中缝双鱼尾上下相对。扉叶墨书大字：“道藏目录详注卷第四”，“无字号计十卷”。下朱书小字：“宋刻分卷与此异，其十卷则同，所异在每卷分合”，系黄丕烈手笔。

此本有叶子寅、许心宸手跋各一则；黄丕烈手跋二十条；陆拙生四条；杨以增四条；张绍仁二条。藏书印记有叶盛及其后裔：“叶氏菴竹堂藏书”；“叶子寅印”；“叶国华印”。明文伯仁“五峰山人”。清许心宸“心宸”。清袁廷枬“五砚楼”、“廷枬之印”、“袁氏又恺”、“又恺”、“五砚楼袁氏收藏金石图书印”。清张绍仁“张绍仁读过”。清黄丕烈“士礼居”、“复翁”、“士礼居精校书籍”、“丕烈”、“菴夫”、“老菴”、“菴夫借阅”、“廿止醒人”、“黄丕烈印”、“菴圃”、“宋塵一翁”、“菴夫手校”、“菴圃手校”。清陆拙生“拙生手校”；清杨以增“宋存书室”、“宋存”、“彦合珍存”、“杨以增印”、“至堂”、“益之手校”，“彦合珍玩”，“杨东樵读过”，“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”。清陈鱣“海宁陈鱣观”、“简藏审定”。傅增湘“双鉴楼藏书印”、“傅增湘印”、“沅叔”。此外尚有“南阳闺秀”、“高阳葵园藏书”以及“北京图书馆藏”等，总计有明清以还的藏书印记七十九枚。

黄丕烈称此钞本为“旧钞”，并累考此本出之于《道藏》。他说：“此（按：指明钞本）……卷端题《刘子》，卷下又有‘无一’至‘无十’号，其为《藏》本出无疑。^①”“此书（按：指《刘子》）世鲜刻本，唯程荣《汉魏丛书》本有之，然脱误甚多，不可据也。是旧钞，以他书《道藏》证之，每叶二十行，行十七字，（按：此行数、字数皆指《道藏》）其自《道藏》出无疑”^②“丙子八月，借元妙观《藏》本校，正文、小注多同，所异者行款错悞耳。……《道藏》本此钞都合”。^③“此《刘子》原出《道藏》，惜有错误”。^④“兹则专取《道藏》原本覆勘之，始知此旧钞本实出《道藏》，唯稍有脱落耳。……而旧钞之为《道藏》，固可即本身字而知之矣。至于字体不尽合《道藏》本，未能一一照改也”。^⑤

此本校文繁复，有朱、墨、黄三色，笔迹各异，真可谓“丹

黄粲然，几致目眩”。^⑥在“防慾第二”、“韬光第四”、“崇学第五”、“专学第六”、“辨乐第七”、“慎独第十”、“从化第十三”等七篇天头，有朱笔批语共十七条。校文黄色笔迹及墨笔下注“藏”字者，出之于黄丕烈手校；其朱、墨二色校文、批语，据傅增湘考证：“黄丕烈以宋本校用朱笔。其宋本阙前二卷，以明翻本配入，改用黄笔校。”^⑦可是，黄丕烈跋又有“旧校者”、“前人朱、墨二笔校改增损者”之谓，而此“旧校者”确切属谁？许心宸跋云：“内钞录多误，朱笔已较正”。^⑧因此，旧校朱笔乃许心宸手笔可以肯定。至于旧校墨笔属谁？难以确断。又据黄丕烈庚午五月一日校跋：“我友周丈香岩家多秘书，向假得活字本校如右，其朱墨两笔旧校者都合。”可知“朱墨两笔旧校者”，是以活字本对校的。所谓活字本，就是黄丕烈得之于周香岩家的“旧刻专本”，亦即后来被傅增湘题作“旧合字本”者。

在此本校勘诸家中，黄丕烈所费功力最多。从他于此本上留下的有明确时间记载的跋语看，最早的是“嘉庆庚午五月一日”，即一八一〇年；最晚的是“嘉庆丙子闰六月”（按：书末尚有一则只署“八月八日烧烛”，似犹晚于“丙子闰六月”，但因未署年间，姑勿论），即一八一六年。只此而言，黄丕烈校此本已达六年整。他先后以“小字残宋本”、活字本、明刻本、《子汇》本、《道藏》本参校其上，并且“佐以西宾陆拙生”^⑨，“不惮至再至三”^⑩，“几于火枣儿糕”^⑪，“心力几悴于此”^⑫。

此钞本究竟出于谁手？根据书中留有的叶盛“叶氏蓁竹堂藏书”以及其后裔“叶子寅印”、“叶国华印”（按：叶国华乃叶盛元孙叶伯寅即恭煥之孙），以及叶子寅题识中有“庚午巳月晦日叶子寅读识”和“辛卯夏五月十七日，晨窗见太翁外舅图记，此册有外舅图记，内子图记补印”等记载的情况看，可以肯定此乃叶氏家传图书。《明史》卷一七七传称：“叶盛，字与中，明昆

山人。正统十三年进士，官至吏部左侍郎，成化十年卒，谥文庄。”《乾隆苏州府志》记叶盛云：“公生平嗜书，手自雠录，至数万卷，常欲作堂以藏之，取《卫风》‘淇澳学问自修’之义，名曰‘蓁竹’。”据此，《刘子注》十卷最大的可能性是出自叶盛。

那么，此钞本流传的情况又如何呢？许心宸“康熙庚寅中秋十八日”题识有：“此书丁丑冬得之梅花馆，越宿即取去。庚辰秋再见之南楼，如逢故人，亟携之归”。按：康熙庚寅，是康熙四十九年（公元1710年），上溯丁丑年是康熙三十六年（公元1697年），庚辰年是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。黄丕烈《士礼居题跋》：“许心宸，字丹臣，明末长洲人；喜聚书，其岳叶九来也，故藏书具有渊源。”又《藏书纪事诗二》：“叶奕苞，字九来，一号二泉（按：叶国华号白泉），清昆山人，文庄公盛（按：指叶盛）裔孙，所居下学斋，蓄书甚富”。许跋所说“梅花馆”、“南楼”、今查：以“梅花馆”为室号者为清钱塘汪韵梅；以“南楼”为室号者有清溧阳任兰枝、清海阳郑倩和清上虞宋璇，上述四人此钞本中并无藏书印记，似无涉。所以，叶氏家传此本，至第六代裔孙叶九来（是否即叶国华未能定）即散出为叶九来之婿许心宸所得。又据黄丕烈跋：“此亦五砚楼物，后以归余者。”^③按：“五砚楼”是袁廷桢的室号。袁廷桢（1764—1810），字又恺，清吴县人，是黄丕烈姻亲。此本留有袁廷桢多枚藏书印记，可知此本在许心宸之后归袁廷桢，袁氏之后又归黄丕烈。黄丕烈（1763—1825），字绍武，号蕘圃，或题蕘夫，亦曰老蕘、复翁、廿止醒人等等，乾隆戊申举人，喜藏书，尤通版本、校勘，是同顾抱冲、袁廷桢、周香岩齐名的吴门四大藏书家之一。黄丕烈之后，此本复为谁有？潘祖印《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》有：汪士钟（閩源）“尽得黄蕘圃、周香岩、袁绶培、顾抱冲四家书”的记载；《藏书纪事诗六》又有“艺芸书舍之藏

书遂为海内冠。其藏书后归菰里瞿氏、致堂杨氏”^④的记述。袁同礼《清代私家藏书概略》云：“黄堯圃士礼居书藏，晚年归于汪闳源（士钟）之艺芸书舍。汪氏广搜宋元旧刻，……又得堯圃、千里诸人为之评定，故所获既精且博。道光辛亥（1851年）壬子（1852年）间，往往为杨至堂（以增）所得，以贮海源阁。”^⑤今查此本并无汪士钟藏书印记，却有多种聊城杨以增的标明“珍藏”、“手校”、“珍玩”、“读过”等藏书图章。这表明此本未必经汪士钟转归杨以增，但在黄丕烈之后曾由杨以增收藏过却是无疑的。杨以增（1787—1856），号至堂，别号东樵，山东聊城人，道光进士，官至漕运总督，其藏书处名海源阁，宋存书室。关于杨以增海源阁藏书的散佚，傅增湘《海源阁藏书记略》记之甚详：“杨氏收书，始于致堂河督，其子协卿太史继之，其孙凤阿舍人又继之。致堂于道光季年，在南中所收，多为汪闳源之物。汪氏得之于黄堯圃。黄氏所得，多为清初毛、钱、徐、季诸家所藏。至协卿、凤阿所收，咸在京师，值咸同间，怡府书散，其时，朱子清、潘伯寅、翁叔平争相购致，而协卿亦颇得精秘之本。……杨氏既以三世藏书嗣其家，举明季、清初诸名家所有古刻名钞，又益以乾嘉以来黄、顾诸人之精校秘写，萃于一门，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。海内仰之，殆如景星庆云。第家出陶南，僻处东海，非千里命驾，殆无由窥见。而杨氏亦深自秘惜，不轻以示人。……鼎革以来，中外坊估，络绎于途，而覬觐终未得逞。逮甲寅（1914年）之冬，余曾于厂肆，得宋蜀刻本《孟东野集》一册，堯圃题识，即为阁中之物，可知是时管钥，固已疏矣。迨丙丁之际，鲁府有收归公有之议，于是杨氏后裔，惧终不吾有，乃检其精要，星夜挈出。至庚午（1930年），屯军阁中，而万本琳琅，遂随佩剑弓刀以俱去矣。”又云，“自阁书散佚之耗出，于是厂估奔走四出，西至保定、顺德、大名，东至德州、济南、青岛，风起云涌，竭力穷搜，萃积于平津各肆，而杨氏后

裔，以旅居耗产，亦出所藏，以求善价。……余三十年来，目想神游，形诸梦寐，至是乃税驾津沽，雅意访延，请于主者，始得寓观。都现存之书，凡宋本三十余部，元本二十余部，而古钞秘校不计焉，如入嫔嬛之府，登群玉之山，目不暇给，美不胜收……”^⑥又，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记此本：“海源阁遗书，庚午岁收得。”^⑦据此再考以此钞本中有傅增湘“双鉴楼藏书印”等图记，可知此本在宋存书室历经三世，于甲寅（1914年）之后散于厂肆，于“庚午”（1930年）终为傅增湘所得。傅氏之后乃归之于北京图书馆。总之，此本流传大致脉络是：叶氏菴竹堂——五砚楼——士礼居——宋存书室——双鉴楼——北京图书馆。

明钞本《刘子注》最主要的价值倒不在原钞，因为原钞既是出自《道藏》，而且讹误颇多，甚至有多处成段注文误入正文者，如：《崇学》第五：“灵珠如豆”下注文：“初如小豆粒，长大径寸，光明一室，人能读。学及成，明神智，自明如斯也。”“镜舌如指”下注文：“以铜为之，以木为舌”。并误入正文。此外类似情况尚有多处。所以，正象黄丕烈所说：“兹既得见《道藏》真本，自然以此为主。”^⑧此钞本之真正价值在于它集中了明清许多校勘大家的校勘成果，集合了宋本、覆宋刻本、活字本、子彙本等多种善本校文于其上。从现在留存的三十二则手跋和十七条批语看，它不仅是研究明钞本《刘子注》的重要材料，而且也是研究《刘子》诸版本的珍贵材料。毫无疑问，此钞本是凝结着许多校勘家心血的，其中黄丕烈所费的心血尤多。可惜的是，由于时日久长，辗转流传，过去未有人重视并加以整理，目前有的校录文字，特别是黄丕烈黄笔校文已经褪色、模糊，难以辨认，有的笔迹混同，难辨谁属，所以着实可惜！

二、明龙川钞本《刘子》

龙川精舍钞《刘子》十卷，书长27.2cm，宽17cm，单蓝线框栏，框高20cm，宽14.5cm。蝉叶，每半叶十行，行满十八字，中缝上单鱼尾，下标“龙川精舍”。自目录卷五《通塞》第二十三前，均已残佚。残存目录前空页有“双鉴楼”阳文朱印一方；正文首页第一行顶格“刘子卷第一”，下留“邢之襄印”、“南官邢氏珍藏善本”、“傅沅叔藏书记”等阳文朱印。此本无注，亦不署著者姓氏，唯留一跋云：“集《刘子新论》十卷，梁刘勰著，抄本。是书分五十五篇，又体与《文心雕龙》相近。”此跋未署姓名年月，不知出于何人手笔。

关于此本的情况，傅增湘有二则记述：

（1）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：

《刘子》十卷，北齐刘昼撰。

明龙川精舍写本，十行十八字，蓝格，版心有“龙川精舍”四字。眉上有校语一作某及考证，不知何人笔。此天一阁佚书，得于厂市。①⑨

（2）《刘子袁注跋》：

《铁琴铜剑楼》所载影宋钞本，细审之乃自《子彙》本出，不足贵也。（中略）嗣得天一阁藏写本，是正尤不可胜计。②⑩

傅增湘上述记载和今藏龙川精舍钞本的书貌，同浙江宁波天一阁有关同志提供的情况相合。一九八三年，我们在进行《刘子》一书的校勘时，为弄清前人见录的几种《刘子》钞本的情况，曾致书天一阁负责同志求教，后蒙骆兆平同志赐复云：“查嘉庆十三年阮元等编的《天一阁书目》子部杂家类有如下记载：‘《刘子新论》，蓝线阑钞本，梁通事舍人刘勰著，序残。’可知天一阁本原藏本是蓝线阑抄本。此书已散出，不知下落。”这里提到的“蓝线阑钞本”正同实物和傅增湘所记合；“此书已散出，不

知下落”，正同傅氏“得于厂市”应；“梁通事舍人刘勰著”，正同今藏未署名题跋及傅跋所记“眉上有校语一作某及考证，不知何人笔”符合。所异者只有一点：《天一阁书目》记载唯“序残”；而今存龙川钞本不仅残序已佚，连目录之前半也残佚无存了。这种不同，可能是由于此本自天一阁散出后，在辗转于书贾厂肆时残损所致。正因为卷前残佚，所以封面题署，天一阁范氏藏书图记等皆不得见。再以文字证之，孙楷第（子书）《刘子新论校释》《类感篇》“弹角则目摇，鼓舟而波涌”条校云：“案各本同，唯范氏天一阁钞本作‘鼓羽而波涌’。按：范本是也。”^①孙先生是傅增湘的高足，我们也曾向孙先生请教，据孙先生信说：“我校《刘子》是以程荣本为底本，所有程荣本以外的本子，都是已故傅沅叔师借给我的。那时我上师范大学，傅先生对我校勘《刘子》热心指导……我据以校《刘子》的天一阁本，是傅先生过录的，不是原书（是傅先生亲笔以天一阁本校××本）。虽然如此，天一阁原本，傅先生曾经教我看。”^②据此，我们以孙先生《校释》所具“范氏天一阁钞本”引文“鼓羽而波涌”验之于龙川精舍钞本，其文字正合。由此可知：今存龙川精舍钞本确是天一阁原藏钞本。

龙川精舍钞本由于《序》已佚传，卷前也已残佚，对其所据及流传情况缺乏确断材料。但是，我们把它同现存的四十多种不同版本（包括钞本）的《刘子》进行了比勘，发现它同现存最早的刻本，即孙星衍、黄丕烈校并跋的“南宋版本”和“明覆宋刻”本十分相近。不仅卷佚分合，每行字数均同，而且佚文异字也基本相近。特别引人注目者，不少地方仅同宋本、覆宋刻本合，而与其他诸本异。为说明问题，今不妨略举数例证之：

（1）《崇学》第五：“耳之初窒，目之始昧，必不恡百金逆医千里。”（程荣本）“逆”，法藏敦煌隋写本伯三五六二、罗振玉藏敦煌唐写本、傅增湘校录何穆恡藏唐卷子

并作“迎”；宋本、明覆宋刻本、龙川钞本并作“连”；明钞本、子彙本、吉府本、蒋以化刻本、道藏本、四库全书文津阁本、旧合字本、影活字钞本、彭元瑞藏旧钞本、百子全书本并作“遭”；余本并作“逆”。

(2)《专学》第六：“将围未围之际，问以奕道则不知也。”(程荣本)“将围未围”，宋本、龙川钞本两“围”字并作空格“□”；而诸本或作“闻”，或作“围”，皆不作空格。

(3)《专学》第六：“当算之时，有鸣鸿过者，弯弧拟之。”(程荣本)“当算之时”，诸本或夺此四字，或作“当算之时”；唯宋本、龙川钞本并作“当算之□(空格)”。

(4)《类感》第五十：“弹角则目摇，鼓舟而波涌。”(程荣本)“鼓舟”，诸本同，唯法藏敦煌唐写本伯三七〇四、宋本、明覆宋刻本、龙川钞本并作“鼓羽”。

诸如上述的例子尚有，为不烦冗，兹不赘举。

这些事实表明：龙川钞本不仅与宋槧相近，而且和宋槧一样，有的还同后来发现之敦煌隋唐写本暗合，这是十分可贵的。这也正说明了傅增湘对此钞本的评价：“是正尤不可胜计”决非虚语。孙楷第先生《校释》多据此本文字，广征博引其他古籍以校他本《刘子》之误，一方面证明了孙先生校书之精，另一方面也足证此钞本之可贵了。

一九八五年二月于上海

注：

①黄丕烈明钞本庚午五月一日跋。

②同上，庚午五月十三跋。

- ③黄丕烈明钞本丙午跋。
- ④黄丕烈明钞本丙子跋。
- ⑤黄丕烈明钞本八月八日跋。
- ⑥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667页。
- ⑦同上。
- ⑧许心宸明钞本“康熙庚寅中秋”题识。
- ⑨黄丕烈明钞本“孟夏十有三日”题识。
- ⑩同上，“四月十八第三次校毕记”。
- ⑪同上，“嘉庆丙子闰六月”跋。
- ⑫同上，“八月八日烧烛”题识。
- ⑬黄丕烈：明钞本庚午跋。
- ⑭转引自吴晗：《江浙藏书家史略》第149—150页。
- ⑮转引自李希泌、张椒华《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资料》第425页。
- ⑯李希泌、张椒华《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资料》第457—458页。
- ⑰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667页。
- ⑱黄丕烈明钞本卷末跋。
- ⑲见该书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5—666页。
- ⑳《刘子袁注》即傅增湘称之为“旧合字本”者，今藏南京图书馆，傅跋书于卷首，末署：“甲子荷花生日藏园居士傅增湘记。”
- ㉑见《西苑丛书》第一辑。
- ㉒此是孙子书先生1983年7月5日亲笔复信的一段。

